

进城农民群体内在类别状况及比较研究

Study On the Inner-Cluster Status of Migrant Farmers

胡宏伟, 李菊英

HU Hong-wei, LI Ju-ying

(1.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2;

2.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3)

[摘要]进城农民群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规模大、结构复杂、衔接城乡, 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对其内在结构的探索并不充分。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两步聚类方法探索进城农民群体的内在群体结构实质发现, 进城农民群体内在“自动”分化为两个群体——“成长型”和“成熟型”, 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 “成长型”进城农民群体人力资本更高、社会资本较低、工作和收入较稳定、市民意识更强。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身份定位与认识”四个方面总体上差异显著。

Abstract: Migrant Farmers are a special group which derives from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is group is becoming the society's focus. However, study on the inner-cluster status of the group is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summarizing of related researches, through Two-step Cluster Analysis and Crosstabs Analysis, this essay is to find the inner cluster status.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cluster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defined as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and the former group have, by contrast, more human capital, more steady employment and stronger urbanization expect. Through the Crosstabs Analysis,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groups are significantly in four important parts - “humancapital”, “socialcapital”, “employment and income” and “self-role recognizafion”.

[关键词]进城农民; 内在类别状况; 比较研究

Keywords: migrant farmers; inner-cluster status; comparative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D422. 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09)02-0014-0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研究”(70533040);教育部应急课题“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2009JYJR004)

[作者简介]胡宏伟(1980-),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讲师;李菊英(1953-),女,河北保定人,教授。

一、问题背景与研究视角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剧烈转型与深刻变革,中国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独特现象。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 1.5 亿—2 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3 甚至更多。^[1]农村劳动力中已有大约 2 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他们为中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三十年的发展,进城农民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并且逐渐分化成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内部群体。如何全面分析和考量进城农民群体内部的各子群体对于深化进城农民研究、促进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至关重要。

单独以年龄变量作为划分依据对进城农民群体结构进行研究是否合理而全面?进城农民群体内部是否存在更为合理的结构划分呢?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通过使用聚类方法,探寻进城农民群体内在的群体结构特点,分析其内部各子群体结构的特点和相互差异,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正确看待和解决进城农民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所探寻的进城农民“内在”分类显著区别于以年龄为依据的新老简单划分,而是综合考量各个方面变量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本研究主要的贡献。

二、数据、变量、方法与工具

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是基于武汉市进城农民的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梅建明副教授 2005 年组织的大规模进城农民状况的调查。武汉市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是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集中了大量进城农民,而且,武汉市重、轻工业和服务业都较为发达,进城农民行业、区域分布均匀,这都使武汉在进城

农民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了更好地涵盖进城农民各方面状况，为聚类分析提供更好的分类标准，本文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身份定位与认识”四个角度选择了共 18 个变量纳入聚类分析^①。

表 1 分析变量表	
人力资本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外出打工时间、来汉打工时间
社会资本	婚姻、来源地
工作形式与收入	就业单位、从事行业、就业性质、进城农民月收入
身份定位与认识	自我身份定位、是否应获市民身份、市民身份是否有影响、是否愿意成为市民、户籍是否重要、投保意愿、阻碍市民化的首要因素

备注：表中变量主要为类别变量和连续变量，此处并无注明，在下文中分析部分，将根据需要将变量级别进行处理，并注明。

本文分析方法主要为两种，通过聚类分析、交互分析方法进行处理。本文分析工具主要运用了 SPSS13.0 和 Excel 两个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三、聚类分析结果与类别中变量描述

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三个变量组作为判定类别的主要依据，纳入两步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分析自动聚类结果，发现类别为两类时，距离测度比值(Ratio of Distance Measure)最大，同时 BIC 比值(Ratio of BIC Changes)比较大。所以，进城农民群体总体上分为两个大的子类别较为合理。^[2]在全部 782 个个体中，纳入聚类分析的有 768 个，其中，73.407%(561)的个体被分类到了第一类，26.953%(207)的个体被分类到了第二类。有 14 个观测量被排除在两类之外。

本部分旨在分析纳入聚类分析的各变量在各类中的分布状况，对于连续变量主要通过分析其聚类中心和离散状况来分析各变量在各类中的分布情况，对于分类变量，主要是通过变量取值在各类中分布的比例来表述分布的差异和特点。根据聚类结果群体的特征差异，本文将聚类分析获得的两个群体命名为“成长型”和“成熟型”两个群体。

表2 类别名称及其特征

类别名称	类别特征	类别子特征
成长型	1.人力资本更高 2.社会资本相对较低 3.工作和收入较稳定 4.市民意识相对更强	1.年纪相对较轻 2.文化水平相对较高 3.工作经验相对较少 4.非本省籍相对较多 5.工作相对较稳定 6.收入相对较低 7.相对更愿意成为市民、更愿意获得市民身份、参加社保等
成熟型	1.人力资本相对较低 2.社会资本相对较高 3.工作较不稳定、收入较分散 4.市民意识相对较弱	1.年纪相对较高 2.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3.工作经验相对较丰富 4.本省籍相对较多 5.工作相对稳定性较差 6.收入相对较高 7.相对更认为是农民,获取市民身份、社保意识等较弱

通过对两个群体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两个群体特点各异、差异显著。

1. 二者在年龄、打工时间和月收入方面差异显著。与“成熟型”进城农民比较，“成长型”进城农民年龄更轻(均值为 22. 812 年，标准差为 4. 889)、打工时间较短(均值为 3. 779 年，标准差为 9. 444)、打工收入较低(均值为 950. 667 元，标准差为 512. 455)，而成熟性进城农民群体上述变量的均值分别为年龄 38. 807 岁(标准差为 9. 444)、打工时间 8. 404 年(标准差为 5. 978)、月收入 1137. 093 元(标准差为 799. 571)。

2. “成长型”进城农民拥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其人力资本更高。在所有受调查进城农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成长型”进城农民占了 68%，而在低学历中，“文盲”中仅有 7. 69%的是“成长型”进城农民，“成熟型”进城农民占了 92. 3%。与“成熟型”进城农相比，“成长型”进城农民高学历者增加，低学历者减少。

3. 非湖北省籍的进城农民更可能是“成长型”。在非湖北籍的进城农民中，有 30. 313%为“成长型”，而湖北籍中仅有 24. 554%为“成长型”。

四、进城农民类别比较交互分析

上文分析揭示了进城农民两个群体及其主要特征和分类依据。为了进一步比较分析两类进城农民在各方面特征的差异，本研究通过交互分析方法计算两类群

体各变量取值的差异性。为了全面反映两个群体的差异,本文设定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身份定位与认识”四个变最群,各变量群中变量与两类群体逐一进行交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两类进城农民在性别、是否愿意成为武汉市民、户籍是否重要三个方面差异不明显。而两类群体其他变量取值差异明显($p \leq 0.05$)。

表3 两类进城农民群体比较的交互分析

变量群	变量	变量取值	成熟型	成长型	Total	备 注
人力资本	性别	女	21.75	24.64	22.53	N=768 $\chi^2=0.724$ $P=0.359$
		男	78.25	75.36	77.47	
	年龄分组	0-20	0.71	32.85	9.38	N=768 $\chi^2=393.317$ $P=0.000$
		21-30	20.14	62.32	31.51	
		31-40	42.25	3.38	31.77	
		41-50	26.38	0.97	19.53	
		51-100	10.52	0.68	7.81	
	文化	文盲	4.28	0.97	3.39	N=768 $\chi^2=53.492$ $P=0.000$
		小学	26.02	8.21	21.22	
		初中	62.03	73.91	65.23	
		高中及中专	6.24	8.70	6.90	
	外出打工时间分组	0-5	40.29	78.74	50.65	N=768 $\chi^2=99.356$ $P=0.000$
		5-10	34.58	19.32	30.47	
		10-15	12.48	1.93	9.64	
		15-20	8.56		6.25	
		20-25	3.03		2.21	
		25-30	0.89		0.65	
		30 以上	0.18		0.13	
	来汉打工时间分组	0-5	60.61	91.79	69.01	N=768 $\chi^2=71.366$ $P=0.000$
		5-10	26.74	8.21	21.74	
		10-15	6.77		4.95	
		15-20	4.81		3.52	
		20-25	0.89		0.65	
社会资本	来源地	非湖北	39.75	46.86	41.67	N=768 $\chi^2=3.144$ $P=0.076$
		湖北	60.25	53.14	58.33	
	婚姻	未婚	0.53	100.00	27.34	N=768 $\chi^2=752.980$ $P=0.000$
		已婚	99.47		72.66	
工作形式与收入	就业单位	个体及私营等	80.25	73.30	78.37	N=763 $\chi^2=4.286$ $P=0.038$
		国有、集体等	19.75	26.70	21.63	
	就业产业	第三产业	62.92	54.59	60.68	N=768 $\chi^2=4.402$ $P=0.036$
		第二产业	37.08	45.41	39.32	
	就业类型	灵活就业	64.17	39.61	57.55	N=768 $\chi^2=37.327$ $P=0.000$
		雇佣	35.86	60.39	42.45	
	月收入	0-500	12.66	16.43	13.67	N=768 $\chi^2=16.909$ $P=0.010$
		500-1000	55.61	57.00	55.99	
		1000-1500	14.26	19.32	15.63	
		1500-2000	9.98	4.35	8.46	
		2000-2500	2.32	1.93	2.21	
		2500-3000	2.14		1.56	
		3000 以上	3.03	0.97	2.47	

续表:

变量群	变量	变量取值	成熟型	成长型	Total	备 注
身份定位与认识	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城市市民	18.60	22.22	19.58	N=766 $\chi^2=11.581$ $P=0.003$
		农民	61.00	47.83	57.44	
		边缘人	20.39	29.95	22.98	
	是否市民应获身份	应该	57.12	67.00	59.81	N=734 $\chi^2=6.508$ $P=0.039$
		不应该	31.65	26.00	30.11	
		无所谓	11.24	7.00	10.08	
	无是否对自身身份影响	没有影响	36.31	46.31	38.98	N=762 $\chi^2=6.249$ $P=0.012$
		有影响	63.69	53.69	61.02	
	是否为武汉市民愿意市民	愿意	55.89	55.07	55.67	N=767 $\chi^2=1.340$ $P=0.512$
		不愿意	29.46	27.05	28.81	
		无所谓	14.64	17.87	15.51	
	户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42.94	43.61	42.96	N=717 $\chi^2=0.000$ $P=0.987$
		重要	57.06	56.99	57.04	
	投资保险	不愿意、没考虑	52.16	40.78	49.10	N=666 $\chi^2=6.775$ $P=0.009$
		愿意投保	47.84	59.22	50.90	
	阻碍的首要市民因素	制度政策因素	52.11	46.53	50.60	N=747 $\chi^2=3.194$ $P=0.202$
		自身因素	35.60	36.63	35.88	
		社会文化因素	12.29	16.83	13.52	

“成长型”进城农民相对更愿意参加社会保障,这一比例高达 59.22%,而“成熟型”进城农民这一比例仅为 47.84%。两个群体都认为阻碍其市民化的首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其次是自身因素(主要是个人素质),这些方面二者差别不明显。

(一)两群体人力资本差异比较分析

由表 3 可见,“成长型”进城农民比“成熟型”进城农民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绝大部分“成长型”进城农民在 30 岁以下,“成长型”进城农民文盲率更低,仅为 0. 48%,低于“成熟型”的 4. 28%,而且,“成长型”中部分人已经拥有了较高文化水平,其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8. 21%,而“成熟型”这一比例仅为 1. 43%。从教育和年龄结构来看,“成长型”进城农民比“成熟型”进城农民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

而另一方面。“成熟型”进城农民的工作经验要远比“成长型”进城农民丰富。Mincer(1974)、舒尔茨(1990)指出,人力资本概念不仅包括教育,健康和工作经验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3][4]}“成熟型”进城农民比较年轻、受教育时间比较长,“成长型”进城农民的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工作经验也不及“成熟型”进城农民丰富。

(二)两群体社会资本差异比较分析

由表 3 可见,“成长型”进城农民更多为非本省籍,基本都是未婚,其社会网络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较窄,其社会资本可能相对较低。这与调查人员的个案访谈结果一致:很多进城青年农民来自外市(武汉以外)、外省,他们往往是因为谋业而到武汉,在武汉有社会关系的较少。“成长型”进城农民基本未婚,

在工作和生活中缺乏家庭这一经济共同体支撑,无法依靠家庭应对和平滑各类风险。这也是这部分群体更有可能感到被排斥和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三)两群体工作形式与收入差异比较分析

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成长型”进城农民更多分布在国有、集体等较为稳定的单位工作,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较高,绝大部分“成长型”进城农民拥有稳定的雇佣关系,而且,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四)两群体身份定位与认识差异比较分析

由表 3 可见,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成长型”进城农民更多自认为是“市民”,相对较少自认为是“农民”。同时,“成长型”进城农民相对更可能自认为是“边缘人”;绝大部分(67%)的“成长型”进城农民认为自己应当获得市民身份,远高于“成熟型”进城农民(57.12%);有无市民身份对“成熟型”进城农民的影响更大(63.69%),而“成长型”进城农民这一比例为 53.69%。在是否愿意获得市民身份、户籍是否有影响两个问题上,两个群体差异不明显(显著度分别为 0.512、0.987)。

“成长型”进城农民相对更愿意参加社会保障,这一比例高达 59.22%,而“成熟型”进城农民这一比例仅为 47.84%。两个群体都认为阻碍其市民化的首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其次是自身因素(主要是个人素质),这些方面二者差别不明显。

五、研究结论、可能的解释与若干思考

(一)研究结论

1. “成长型”和“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根据两步聚类方法探寻进城农民群体的内在分类,发现进城农民主要分为两个群体:“成长型”和“成熟型”。相对而言,前者人力资本更高、社会资本较低、工作和收入较稳定、市民意识更强。后者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社会资本相对较高、工作较不稳定、收入分布较分散、市民意识相对较弱。

2. 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成长型”进城农民相对年纪更轻、文化程度更高,比“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有更大的“空间”。但其工作经验比“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低,这也是其当前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后者的主要原因。

3. 两个群体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成长型”进城农民相对非本省籍更多、基本未婚，其社会网络相对较窄，社会资本相对较低，这也影响了其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

4. 两个群体在工作形式与收入方面的差异。“成长型”进城农民工作更为稳定，雇佣关系相对更规范，收入水平普遍低于“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

5. 两个群体在身份定位与认识方面的差异。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成长型”进城农民对城市亲切感和归属感更强，更希望获得市民身份、融入市民生活，也更愿意参加社会保障。二者均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其市民化的首要因素。

(二)可能的解释

1. 一个区分：“成长型”进城农民不是新生代进城农民(农民工)。必须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的“成长型”进城农民并非部分学者所指的新生代进城农民(农民工)。虽然，二者在年龄结构方面十分相近，而且，在群体特征方面、观测对象覆盖范围方面也较为类似，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一个群体。不同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基于年龄指标进行划分，本研究所指的“成长型”进城农民的确定依赖一个更为广泛的综合考察体系，涉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三大方面、多个变量，是多维度、多方面考察的结果。就进城农民群体的划分而言，划分为“成熟型”、“成长型”两个群体，显然更加符合这一群体内在特质，这比单独以年龄为标准划分符合进城农民群体的本质特征。当然，研究需要不同也是造成对这一群体不同划分标准的重要原因。

2. 为什么“成长型”进城农民有相对更高的人力资本?如上文所述，“成长型”进城农民普遍比较年轻，而这些人比上一代接受了更长时间的教育，年龄优势和教育累积的人力资本使这一群体在就业等行为方式方面显著区别于“成熟型”进城农民。当然，“成长型”进城农民工作经验低于“成熟型”进城农民。但总体而言，“成长型”进城农民人力资本优势更为明显，其发展的“潜力”相对更大。

3. 为什么“成长型”进城农民有相对较低的社会资本?由于“成长型”进城农民流动性比“成熟型”进城农民更强，流动范围更大，跨省流动的可能性更高。所以，“成长型”进城农民更多是非本省籍，这也造成了其在流入地比当地进城农

民拥有较少的社会关系和网络。当然，这一群体普遍年轻，社会关系积累时间相对较短也是其社会资本相对较低的原因。

4. 为什么“成长型”进城农民工作更稳定而收入却更低?由于人力资本相对更高，尤其是文化程度相对更高，“成长型”进城农民更可能进入较为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与用人单位形成较为稳定和规范的雇佣关系，所以，他们相对更多分布于第二产业，更多分布于国有、集体等劳动关系较为规范的单位。但是，由于工作经验尚不丰富，与“成熟型”进城农民相比，他们获得收入相对较低。但在未来，“成长型”进城农民群体将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

5. 为什么“成长型”进城农民更希望融入城市?“成长型”进城农民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有更为稳定的工作，同时，他们很多较早就流入城市，很多是自幼便跟随父母流入城市，在城市长大并接受了教育，所以，这部分群体相对而言对城市生活更为适应和向往，更希望融入城市。而当他们遭遇现实的制度与政策壁垒、市民化进程受挫时，则被城市排斥的观念更为强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群体自认为是“边缘人”的比例相对较高。而“成熟型”进城农民年纪相对较大，大部分是成年后才流入城市，大部分户籍和家庭部分成员还在农村，对农村的适应和归属感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成熟型”进城农民更可能自认是农民的原因。调查中了解到，不少“成长型”进城农民较少或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不太熟悉，较少向往农村生活状态。

(三)若干思考

1. 对进城农民的认识要与时俱进。制定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和进城农民的政策措施一定要基于进城农民群体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应考虑到进城农民群体的内部结构，不能不加以区分地假定进城农民都是文化程度较低、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社会参与意识差，等等。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探索出了进城农民群体内在的结构，“成长型”和“成熟型”进城农民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方式和收入、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一定要考虑到两个群体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不能忽视“成长型”进城农民的特征和要求，对进城农民群体的认识要与时俱进，要考虑内部结构性问题，制定长期劳动力流动与市民化政策要充分考虑这部分群体的需要。

2. 制度改革与权利获取。本研究发现两个群体的进城农民均认为阻碍其市

民化的首要因素是制度因素，这也与现实状况相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权利、福利等使进城农民群体成为城市中的特殊人群，他们没有城市户口、缺乏平等就业机会、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等各类社会权利和福利，这极大地制约了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即使在工作、居住、收入等方面与市民不存在差别，他们也无法享受市民所拥有的权利和福利。改革户籍制度，弱化附着于其上的各项社会权利和福利至关重要。同时，应以国民身份为基础，大力推进社会权利和福利的平等化进程，首要是推进城乡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进程中，推进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统筹、乃至一体化至关重要，是促进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的重要政策保证。

3. 要关注“成长型”进城农民群体的城市适应与融入。本研究析出的两个群体中，由于“成长型”进城农民相对更希望融入城市，所以，这一群体的城市适应和融入至关重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特别关注。由于市民化意识相对较强，如果现实中城市适应受挫，则这一群体很可能因被“边缘化”而沮丧、不满，对城市生活、市民以及现行制度政策产生较为激烈的反应。所以，应特别关注这部分群体在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方面的状况，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尽量创造制度和社会氛围鼓励这一群体融入城市，同时，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应关注这一群体心理问题，对不稳定的心理倾向要正确引导。以免社会关系激化。当然，促进市民化根本上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城市化加速和市民化政策变革。

4. 要关注“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的养老问题。本研究揭示“成熟型”进城农民相对更可能对农村有较好的适应性和归属感，而事实上这部分群体成为市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更多的还是将要最终回到农村养老。这就带来了一个“成熟型”进城农民养老的难题：(1)这部分群体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社会财富，最后养老却在农村，消耗农村财富，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城乡分化；(2)这部分人工作在城市，其中一部分由于没有很好的劳动保护而患上了职业病，甚至一定程度残疾，这将增大这部分群体的养老支出；(3)由于城市化加速，这部分群体的子女(农村青壮年农民)大部分流入城市务工，部分最终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或者通过考试等方式成为市民，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保障能力日益弱化。所以，如何保障“成熟型”进城农民群体未来的老年生活成为一个难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普遍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推广和完善农村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制度，通过社会风险分担方式，保障这部分人未来能够有效应对老年和疾病风险。

注：

①“身份定位与认识”变量组仅在下文中交互分析部分使用，其他三个变量组纳入聚类判别分析作为主要标准。此外，由于调查预期设计、实际填写质量问题，社会资本项目仅有来源地和婚姻状况填写状况较好，所以，本文仅用这两个变量来反映进城农民的社会资本状况。当然，应当承认，这两个变量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资本。

[参考文献]

- [1]蔡畴，都阳.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7)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7.
- [2]卢纹岱. SPSS for Windows 统计分析[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392-403.
- [3][美]舒尔茨. 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2-96.
- [4]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49-199.